

(苏) 艾特玛托夫

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

陈学迅 译

新疆大学出版社

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

[苏]艾特玛托夫 著 陈学迅 译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4号)

新疆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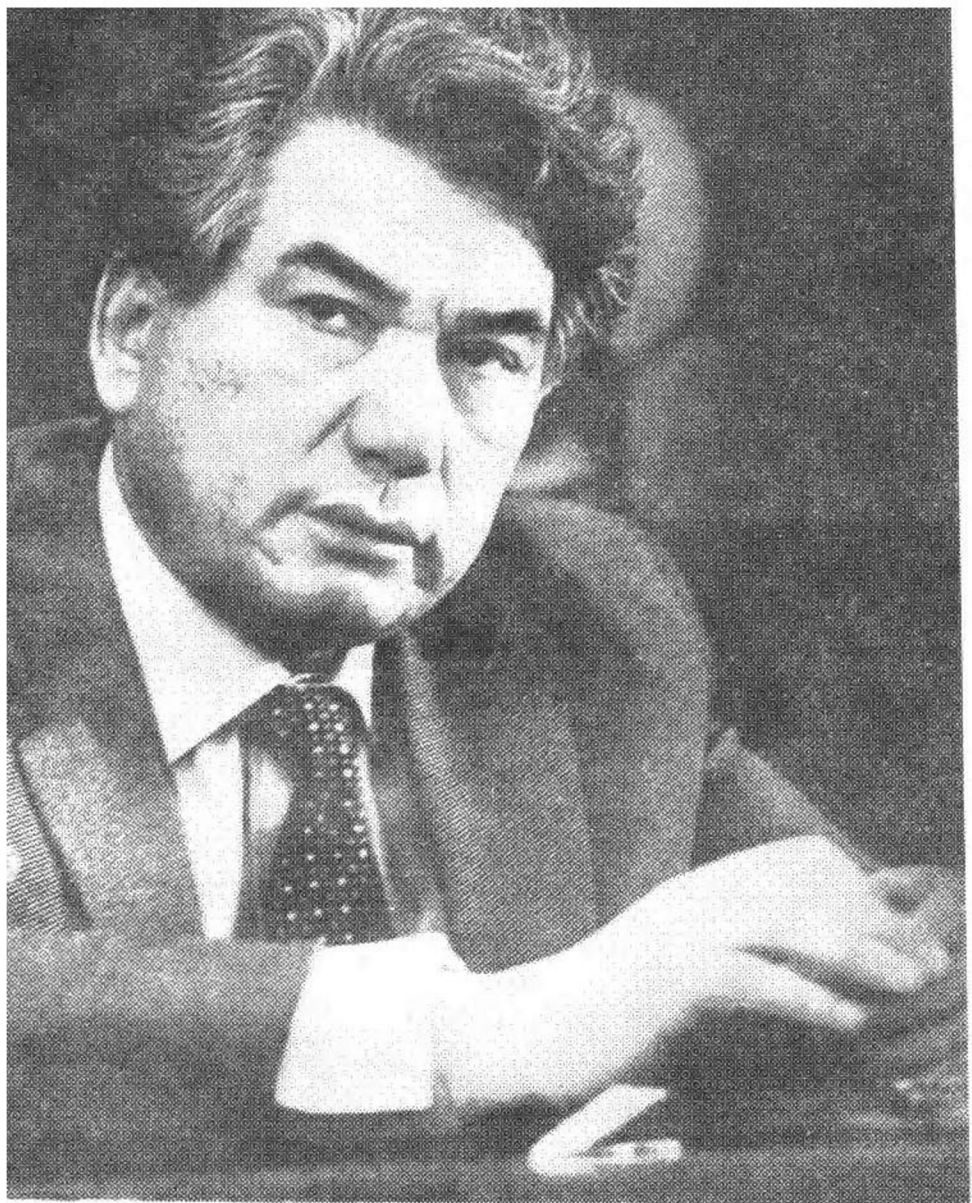
850×1168 32开 8.375印张 插页3 200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631—0005—9/I·0000

书号: 10500·0001 定价: 1.80元



作者像

理解的桥梁

(代中译本序)

周 政 保

一个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必然是一个作家与理论批评家（或者说是文学研究者），因为真正的文学翻译总是意味着某种规范内的新的创造，就文学作品而言，那种语言的转换，那种格调的认定，那种描写氛围乃至人物性格与文化背景的理解及把握，都渗透了翻译家的感受力与表达水平。这当然是一种艰辛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劳动。所以，我一向对那些兢兢业业的劳作的翻译怀有一种崇高的敬意——尤其是在对外实行文化开放的今天。

陈学迅是我研究生学习期间的同学，不过，他的研究方向是俄语文献翻译，而我所学的则是中国当代文学，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种种交流。而在这种交流中，使我进一步感到翻译工作能起到的重要桥梁作用。陈学迅是一个勤奋的人。他翻译过不少苏联小说，也对翻译理论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他研究过苏联的文学大师高尔基，也坚持不懈地讨论过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创作及其文学观——这本被译成汉文的艾特玛托夫的创作谈《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就是他悉心研究艾特玛托夫的一种标志。艾特玛托夫的这本著作，几乎囊括了这位著名的苏联吉尔吉斯族作家的全部创作经验与文学理论主张，它的翻译与出版，无疑可以增进我们对于这位优秀小说家的认识与

理解。同时对于我国的包括少数民族作家在内的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批评，也将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提示或启发。而且，在进一步认识与理解艾特玛托夫的文学创作及理论主张方面，这本“创作谈”的问世，也许可以造就一条更为直接的“通道”，即获到一种更为明晓、更为理性、也更为准确的掌握（这对于不通晓俄语的读者来说更是如此）——特别是就翻译的同等能力来说，理性表达的原意原貌的损耗总要比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少一些，因为即使是在最出色的翻译家那里，在经由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之后，文学作品的原意原貌的些许损耗历来是难以避免的，其中只是程度的不同罢了（那种“美文不可译”的说法，大约就源于这一意思）。

艾特玛托夫是苏联的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但他的文学成就以及这种成就所造成的影响，却早就超越了自己的民族生活范围，而且步出国界而蜚声世界文坛。他的作品据说被译成九十多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他的全球性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他真正做到了面向自己的民族、面向自己的国家、面向整个人类的生存世界——面向世界是不容易的，但对艾特玛托夫来说，这毕竟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本身不就在向我们诉说一种文学创作的奥秘吗？不言而喻，艾特玛托夫的这一奇迹，以及他这本“创作谈”，是可以帮助我们揭示这一奥秘的真实内容的。

艾特玛托夫是吉尔吉斯族人民的儿子，他的创作与自己民族生活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他是一个从底层生活走向文学世界的作家，他的故乡舍克尔几乎构成了他与整个人类生活相融合的连接点。这样，他就不仅仅是吉尔吉斯族人民的儿子，而且也是人类的儿子。他的《白轮船》、他的《一日长于百年》、他的《永别了，古利萨雷》等小说，都是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得苏联列宁奖和国家奖，并继肖洛霍夫之后于一九八三年当选为全欧科学、艺术、文学研究院院士。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创作与苏联政治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但它是一

II

个正直的、富有社会思想头脑的、也是为追寻真理而疾恶如仇的小说家，特别是他对于小说艺术的探索，更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在这本“创作谈”中，他的关于创作与生活，关于作家与理想，关于文学的当代精神，关于文学的人类意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及双语创作的问题，关于各种文学传统（包括神话传统）的问题，都联系自己生活体验与创作实践作出了精当而切合实际的阐释与发挥。尤其要说到的是，艾特玛托夫不是一个远离政治与漠视社会生活现实的小说家；相反，他对于政治的或世俗的社会现实往往给予更多更直面的关注。据报道，1986年他又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死刑台》，而且又引起了苏联文学界的争论。艾特玛托夫在这部新作中把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对善恶、罪罚，以及文艺宗教、历史人物评价、生态平衡等问题的探索融为一体，从而使他的文学描写获到了某种历史哲学的深广度。当然，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及其所描写的方式，或许是艾特玛托夫小说创作的一贯方式，或者说保留了相当的延续性。但这里仍然说明：艾特玛托夫并没有因为他的创作涉及了政治、涉及了社会改革与现实问题而降低了他的作品的艺术份量及文学声望——问题恰恰在于怎样描写，或在于作家是否具备一颗寻求真理与体现人类愿望的艺术良心。就此而言，艾特玛托夫的“创作谈”对一些企图脱离政治、脱离矛盾的社会生活的作家是产生相应的启迪作用的：只有面向自己的生活、面向自己的民族、面向自己昂扬而又充满改革的痛苦的国土，并诉诸于深深的审美思考与艺术寻求，我们才可能实现所谓的“走向世界”——我想艾特玛托夫的“走向世界”就是这样的。

这本译著的另一价值还在于：我们可能更丰富地借鉴苏联当代文学的某种经验。这几年来，我们在引进国外文学方面，尽管对于苏联当代文学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创作界与理论批评界，更多的注意力被“西方”现代文学所吸引。这就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平衡。实际上，苏联当代文学的不少成功的经验或

不成功的教训，反而于我们的整个文学发展及具体创作具备更为丰富多彩的借鉴意义——艾特玛托夫就是如此。其实，就我国的作家而言，艾特玛托夫已经于他们的心目中产生了相应的位置与影响。这一点我想是不必多说的。

当然，陈学迅所翻译的这本著作将在新疆出版，而新疆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吉尔吉斯族（在我国称柯尔克孜族）。这里云集着许许多多操持各种语言的少数民族作家，于是我想，艾特玛托夫的创作之于我们，势必会产生更为积极直接的驱动力与借鉴作用。但愿如此。

我对苏联当代文学缺乏研究，所以就不敢就此妄言。现在写下的这些感想式的文字，就算作是《对文学与艺术的思考》这本书的中译本的序吧。

1987年2月于乌鲁木齐

目 录

自述·····	(1)
性格和当代精神·····	(12)
主要的书·····	(17)
善，是不可战胜的·····	(24)
我的回答·····	(30)
对未来负责·····	(37)
由语言组成的宇宙·····	(49)
人在两种语言之间·····	(55)
通往明天的道路·····	(60)
我们的高尔基·····	(66)
必要的说明·····	(71)
艺术技巧问题·····	(78)
攀登·····	(84)
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90)
相互协作的范围·····	(94)
没有水滴就没有大洋·····	(112)
连结点·····	(115)

精神支柱·····	(141)
世界文学的殿堂·····	(148)
要开拓自己的命运·····	(156)
我们改造世界， 世界改造我们·····	(169)
平等中的平等·····	(182)
作家——自己时代的良心·····	(190)
一切都关系到大家·····	(202)
万有引力定律·····	(213)
母语的奇迹·····	(223)
书中的话—— 代表了我的心灵·····	(230)
在全苏作家第七次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249)
附录：	
艾特玛托夫创作年表·····	(258)
译后记·····	(259)

自述

为公布于众，为给别人看，要写一份自传是相当难的差事。谁知道该怎样写才好？是详尽地描述自己的一生，还是简短些好呢？你写多了，人们会说：瞧他这文章——裹脚布，又臭又长；你写短了，又会说：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东西，既然缺乏有意义的经历。总之，最好还是别动笔……

但是，既然该我碰到这样的事，那就试一试吧——我已经年过四十，我的经历大概总还有什么可写的吧。

在我们的山村里，认为了解自己的七代祖先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老人们在这一点是很严厉的。平常他们就这样考问孩子们：“喂，巴图尔，说呀，你是谁家的孩子？你父亲的父亲是谁？祖父的父亲呢？那祖父的爷爷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干什么的？大伙是怎么看他的？”如果发现哪个孩子不知道自己的家谱，那责难的声音就会传到孩子父母的耳中。人们会说，这父亲是怎么当的？不记家谱，不记族谱？让他看一看，人从小长大，怎么能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呢……云云。这一辈辈传种接代和血缘之间的相互道德责任感全都表现在这里。可能已经有人注意到：在中篇小说《白轮船》中，我曾试图借助于小孩的口来阐明这一点——当他和前来的司机谈话的时候。

正象现在一般说的那样，我最好就从这儿，从“封建残

余”开始我的自传吧。我要说的是，我出身于舍克尔家族，舍克尔是我们家族的鼻祖。我的父亲叫托列库尔，祖父叫艾特玛特，曾祖父叫基姆比尔德，高祖父叫康楚德尧克。这就够了吧。再往上就是单纯地数名字，而名字我又一无所知。再说也没什么人，能给我讲讲他们的生平。我的高祖父康楚德尧克传到我这儿的可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绰号。他一生中脚上穿的是两块生皮革裹下的皮窝子，因此人们都叫他康楚德尧克——那意思是“不穿鞋的人”。因此，我们是“不穿鞋的人”的后代，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但也只好如此罢了……

我下面要讲的一切，正好不是父亲传给我的，他没有来得及讲，也顾不上讲这些东西。

所有这一切，我首先要感谢祖母阿衣木汗·萨旦——和她的女儿、我的姑妈——卡拉基孜·艾特玛托娃。真是奇妙极了，一个母亲、一个女儿，她们两个竟如此的相似——无论是外表长相，还是性格和精神气质——都相差无几。对我来说她们俩真是难分难辨，就象祖母有两张面孔一样，一张年老，一张年轻。我真感谢自己的命运，她使我看见并认识了这两位优秀、聪慧、美丽的女性，——她们实际上也真长得很美……对我来讲，她们两位就是家族历史和古代民歌的教师，

祖父艾特玛特我没见过，大约在1918年至20年间他就去世了，而我到1928年（12月12日）才出生。

在我们舍克尔村（位于基洛夫区的塔拉斯河谷）的边缘，在库尔库列乌河的河滩上，至今还放着一块下陷到泥土里的旧磨盘。岁月流逝，这块磨石越陷越深，也越来越遭到破坏。这地方就是我祖父的磨房遗址。

大家都传说，他是一位能工巧匠。他会做衣服，是他第一个从城里运来了缝纫机，从此他得了个美号：“裁缝师付艾特玛特”。做鞍子，镀锡焊接，弹考姆孜琴，他样样都在行。他还会读阿拉伯字母。但是他还是毕生受穷没能摆脱债务和贫

困的束缚。因为他畜无一头，所以从不放牧。

祖父奋力拚搏，想摆脱穷困。他决定筹建一座水磨，希望能挣些收入使家庭富起来。他把自己和他弟弟比里姆库尔两家的全部积蓄都投进了磨房。那一年的整个夏天，全家动手，从库尔库列乌河上挖了一条通向水磨的引水渠（至今旧迹还隐约可见），还垒起了墙，盖上了屋顶。一年过去了，磨房终于开张营业了。但是晦气附身的艾特玛特还是没走好运。一场大火，除了磨盘石外，全都烧个精光。彻底破产的祖父带着十二岁的儿子——我的父亲托列库尔，到玛依玛克车站附近的铁路工地上去修隧道去了。就从这儿起，在当地俄罗斯当局的帮助之下，我的父亲进了阿乌里耶——阿塔城（今日的江布尔城）地方俄罗斯学校上学。

我写这一点不是为了增加闲谈的趣料。因为世上万事必有其因。如果那座不幸的磨房不烧毁的话，祖父就不会去修铁路，我的父亲也就未必能到城里去学习。在革命最初的年代里，我的父亲已经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稍后他又曾两度去莫斯科学习），他是最早的吉尔吉斯共产党员之一，当上了领导，对政治和文学特别感兴趣。同时我的母亲纳吉玛·哈姆杰耶芙娜·艾特玛托娃，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完全是一个当代女性。这种情况促使他们很快向我介绍俄罗斯文化，介绍俄语，进而介绍俄罗斯文学——当然是儿童文学。

另一方面，祖母常常把我——自己的孙子接回山里去，夏天一同转场。她是一个极富魅力而又聪明过人的妇女，受到全村人的尊敬。对我来说，她就是一座神话和民歌的巨大宝库！她有讲不完的真假难分、无奇不有的趣事轶闻。我亲眼见过当年牧民转场的真实情况。转场，不只是驱赶着畜群，从一地向一地转移，而且还是盛大的牧民生活和宗教庆典的综合演示。这是一场方式独特的展览会，会上展出了最好的挽具、最好的装饰、最好的马匹、最好的架在骆驼身上的驮子以及用地毯、

马衣包盖的行李。一位位美丽的姑娘都要当众亮相，一个个唱歌的能手都要即兴歌唱，时而可以听到悲切委婉的哀歌（如果他们要向埋葬亲人的墓地告别的话）和动听悠扬的旅途歌声。从他们刚开始上路起程的时候，我就见到了这壮观的场面，直到转场结束，这鲜艳的图景才逐渐消失。

看来，正是祖母坚定不移地向我灌输对母语的热爱。啊，母语！颂扬她的话实在是太多了！母语的神奇魔力是不可解释的！只有从童年就掌握和理解的母语，才能使心灵装满由人民的经验而诞生的诗篇，才能使人的民族自豪感永不衰竭，并从先辈语言的丰富多彩的含义和节奏中，得到美的享受。童年不仅仅是美好的时期；童年，还是一个人未来个性的核心。正是在童年时代才造就对母语的真正认识，正是这个时期人才感觉到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和一定的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至少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要说，一个人在童年时代，就能有机而牢固地掌握两种平行接触的语言，而且还可能更多些，如果这些语言从幼年起，就能同时对他发生作用的话。对我来讲，俄语也是母语，其程度决不亚于从童年时代起就成了我毕生母语的吉尔吉斯语。

当我五岁的时候，我就第一次充当了翻译的角色，那赏赐给我的一块熟肉，竟成了我的第一次“稿费”。这件事发生在夏牧场上，当时和往常一样，我跟祖母住在一起。那是刚刚兴办和巩固集体农庄的年代。农庄不久前刚购买的一匹种马突然死去。马是在大白天死的，肚子胀的圆圆的，还喘着粗气。牧马人非常惊慌，因为种马很昂贵，是顿河种马，从遥远的俄罗斯运来的。当下立即派了骑手回农庄报告，接着又转到区上。隔了一天，一位俄罗斯人进山来找我们。他高高的个头，一大把棕色胡须，两只蓝眼睛，穿一件黑色的皮上衣，旁边还背了一个挎包。我把他记得很清楚，他连一句吉尔吉斯话也不懂，

只有我和他能用俄语谈话。当时需要彻底检查，弄清牲畜死亡的原因，好填写死亡证书。牧马人毫不犹豫，当下就决定由我来当翻译。我当时站在孩子堆里，正在看这位来人的热闹。

“过来！”一位牧马人抓住我的手说，“这人不懂我们的话，他讲什么，你翻译，然后再把我们讲的，译给他听。”

我又羞又怕，猛地挣脱了他的手，跑进了祖母的帐篷。一大群小朋友怀着好奇心，也吵吵嚷嚷地跟在我的后头。不一会那个牧马人又跑来找我，埋怨我不该走开。祖母一向待人和蔼，这一次却严厉地皱起了眉头：

“你为什么不想跟来的人谈话，要知道现在请你去的都是大人们，难道你不懂俄语？”

我没有开口，小朋友们正躲在帐篷外边看结果。

“你怎么了，是说俄语害羞，还是讲我们自己的话害羞？所有的语言都是真主恩赐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去吧。”她抓住我的手，走出了帐篷。小朋友们又跟在了我的后头。

在欢迎客人的帐篷里，已经作好了一锅新鲜羊肉，里面挤满了人，大伙正在喝马奶酒。山下来的兽医正和一些长辈白须老人坐在一起。他招我进去，笑眯眯地说。

“过来，小孩，到这儿来。你叫什么？”我轻轻地嘟囔了一句。他抚摸着我的头，说：“你问一下他们，这四种马是怎么死的？”说着，还取出一张纸做记录。

人们都静下声来等待我开口，我却紧闭嘴唇，说不出一句话来。祖母也坐在那里，神情怪尴尬的。这时有个老头，我们的一位亲戚，把我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搂在怀里，对着我的耳朵非常信任、非常严肃地说：

“这个人认识你的父亲，他会向你的父亲说我们的坏话，会说他的儿子在吉尔吉斯人那里长得太不象话！”接着，他又高声宣布，“现在他马上开口。你跟我们的客人讲，这个地方叫乌乌——萨孜……”

“叔叔，”我胆怯地说，“这个地方叫乌乌——萨孜，意思是有毒的草场……”我看见祖母和来客，还有所有在场的人，都很高兴，我也渐渐壮起胆来。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一次同声翻译，逐词逐句地用两种语言谈话。种马原来是吃了毒草死的。来人问，为什么别的马不吃这种草，牧马人解释说，当地的马匹是不吃这种草的，它们知道这种毒草不能吃。我把这些情况一一作了翻译。

来客夸奖了我，白须老人奖给我整整一大块羊肉，又热又香，我喜气洋洋地蹦出了帐篷，一下子就被小朋友们围住了。

“啊，太精彩了！”他们赞美地说，“你讲俄语，就象河里的流水那样畅快，一刻也不停！”事实上我翻译得结结巴巴，但是小朋友们就愿意大肆渲染。我们当下就把肉分完吃掉，跑去玩了。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这些事值得重提吗？照我看，值得。应该从一个人最初记忆的那些事开始，从发生这些事的时间开始。有些人能记住自己三岁时的事物，而另外一些人则只能记住自己十岁时的遭遇。我深信，所有这些都有着重大意义。比如我孩提时代的这起遭遇就是这样的。祖母对我很满意，后来常常向认识的人们讲述这段经历，她的心灵充满自豪感。

祖母使我的童年过得很美，她给我讲了许多神话和民歌，让我见了许多说故事的能手和歌手。祖母走到哪儿都把我带在身边，婚丧喜庆，添人摆宴，每次作客都少不了我。她还常常给我讲梦中的故事，这些梦都相当有趣，只要她稍打瞌睡，我就立即叫醒她，要她给我讲在梦中的所见所闻。一些又小又短的梦已经不能使我满意，这时她就跑到邻居家里去“借”点什么梦来。往后我才明白过来：她纯粹是为了我才在那儿编这些梦的。

祖母不久就死了。从此我就一动不动地住在城里的家中。后来我进了学校。两年以后我又回到故乡的山村。这一次时

间很长，而且环境相当艰难。

1937年，我的父亲、党的干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学员，遭到清洗镇压。我的家便移居故乡。就从这时起，我才开始经受真正的、错综复杂的生活磨炼。

在那困难的岁月，是父亲的姐姐，卡拉基孜姑妈保护了我们。我们有了她，真是幸运极了！对我来讲，她代替了祖母的位置。就象祖母一样，她也是一位讲故事的能手，她知道许多古老的民谣，在山村也享有同样的荣誉，受到同样尊重。我的母亲回村的时候正生着重病，后来她病了很久很久。我们一共四个孩子，我是老大。

处境相当困难，但是卡拉基孜姑妈让我们看到：不管有多大的灾难降临到人的头上，只要生活在人民中间，你就不会无望。不仅我们本家同族的亲戚——舍克尔的子孙（当时这个“封建残余”给了我们无法估量的帮助），而且还有四周的邻居，还有那些从前素不相识的人们，都没有在我们灾难临头时袖手旁观，没有躲避我们。他们尽其所能，与我们分享仅有的粮食、燃料、马铃薯，甚至还有保暖防寒的冬衣……

有一天，我和弟弟伊尔吉斯—— he 现在是学者，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矿山物理和机械研究所所长——在地里拾柴禾，一位骑手从大路上向我们折来。他骑着一匹骏马，衣着很漂亮，

“你们是谁家的孩子呀？”他问道。

我们的卡拉基孜姑妈经常教导我们说，碰到这种情况要抬起头，直视对方的眼睛，应该说出自己父亲的大名。我和弟弟当时心情十分难受，因为看到了报上刊登的有关父亲的材料，可是，卡拉基孜姑妈并不羞于这种耻辱。这位不识字的女性不知通过什么方法，心里十分清楚：这全是谎言，根本就没有那回事。但是她却解释不清自己的信念。我当时已经读了一些有关契卡侦察员的书，心中暗暗幻想着，希望能把我派去抓什么

特务，希望我能抓住他并最后牺牲，以此证明我的父亲在苏维埃政权面前是清白的。

当时那个大路上折进来的人，问我们是谁家的孩子。虽然这事非常痛苦，但是我没有垂下目光，直接说出了父亲的姓名。

“你拿的什么书？”他又感兴趣地问。

我现在记得，那是一本地理课本，就别在我的腰上，他翻了一下书，问到：“你们想上学吗？”

那还用说！我们点点头，紧咬着嘴唇，为了不让泪水流出来。

“好，你们很快就可以学习！”说完就走了。

过了一周，我们真的进了学校。那个人原来就是教师，叫特纳里耶夫·乌苏巴雷。我进了女教师英卡玛尔·卓洛耶娃的班。当时她对我十分同情。

我很早就开始劳动：从十岁起就熟悉地里的农活。

又过了一年，我们搬进了区中心俄罗斯人集居的基洛夫镇。母亲在那里当会计，我又重新进了俄罗斯学校。

生活刚刚有点改善，就爆发了战争。

1942年，我被迫辍学。在战时要教育我们几个孩子，母亲感到力不胜任。

我又回到了舍克尔村。故乡为战争而负担沉重，也贫困到了极点。我被指定担任区苏维埃的秘书，因为我是村中文化较高的一个少年孩子，而当时又找不到别人来担任这项工作。我那时才十四岁。

但是谚语说的好：没有坏事就没有好事。如果说是童年时代从光明的方面，从诗情画意上去认识生活，那么现在生活就以她自己严峻的、毫无掩饰的、痛苦的、并且充满英雄气概的面貌，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看见自己的人民正处在一种特定的状态下——那就是祖国最危急的时刻，人民的精神和体力达到